



*Wissenschaft als Beruf*  
*Politik als Beruf*

# 伦理之业

马克斯·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  
(最新修订版)

Max Weber  
【德】马克斯·韦伯 著  
王容芬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Wissenschaft als Beruf*  
*Politik als Beruf*

# 伦理之业

马克斯·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

(最新修订版)

Max Weber

【德】马克斯·韦伯 著

王容芬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理之业: 马克斯·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德)韦伯著; 王容芬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633-7836-4

I. 伦… II. ①韦…②王… III. 韦伯, M. (1864~1920) — 哲学思想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095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395790-103/168

上海长阳印刷厂

(上海市杨浦区嫩江路 199 号 邮政编码: 200438)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5.75 字数: 10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出版说明

本书译自德文原文,初版1988年,本版为修订版,参考《马克斯·韦伯全集》第17卷及德国韦伯学者有关阐释校订。译者系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人员,联邦德国汉诺威大学哲学博士,我国韦伯著作的主要翻译与阐释者,著有《独裁与霸权政治——从史学与著作史角度解析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马思想》(*Cäsarismus und Macht politik. Eine historisch-bibliographische Analyse von Max Webers Charismakonzept*,柏林Duncker & Humblot,199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8年10月

“新野介个一景”业”

## 再版译序

1917年11月7日和1919年1月28日，韦伯应自由学联巴伐利亚分部邀请，在慕尼黑做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演讲。这是巴伐利亚自由学联组织的系列演讲中的两篇，学联原计划将所有演讲汇编成集，但没做成。出过韦伯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的 Duncker & Humblod 出版社为两篇演讲出了两个单行本，付印前作者悉心按照记录修改过，某些部分甚至改动了原意。1920年4月韦伯故去，遗孀玛利亚娜为他编辑文集，将这两篇分别收进《科学理论论文集》和《政治论文集》，两篇演讲得以流传。本书即由两部文集收录的修订篇译出。这次中文本再版修订时参考了1992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全集》第17卷（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

### “业”是一个伦理概念

韦伯所说的业很有讲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路德的‘业’概念”里,韦伯做了一个将近3页长的注释<sup>①</sup>,专门讲这个业。德语里的 **Beruf**,现在是职业的通称;古德语的 *beruof* 原意是信誉、声名,作动词用时则有感召之意。马丁·路德翻译《七十子圣经·西拉子智训》第12章第20和21节时使用了这个词的动名态 *Berufung*,使希腊原文中的“职位”和“工作”有了奉神之召的含义。从此 **Beruf** 成了职位,授予官职叫 *Berufung*,仍有奉召之意。教授是教育界的官职,要由大学所在州主管教育的州长任命,某人被任命为教授,叫作“奉召作教授”。韦伯的两篇演讲的题目使用的也是 **Beruf**,这个业就有了使命的含义,不是养家糊口的饭碗,而是作为使命的职业,伦理之业,或者叫天职。因此,韦伯的两篇演讲不同于他以往的学术著作,包括早期的法学和国民经济学著作及成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著作,也不同于他在一战中和战后的大量政论文及政治演说。因为讨论的对象是具有伦理价值的职业,所以它们更像哲学论文。

#### 以学术为业

做《以学术为业》的演讲的时候,韦伯是自由人。14年前他辞去海德堡大学的教职;那门受罪的国民经济学课,毁了他的健康,耗干了他的激情。开课那几年,他成了频频请病假的老病号,一篇文章也没写出来。辞职以后,韦伯完全换了一个人,病好了,学术成果累累硕硕:创办《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期刊,完成了《新

<sup>①</sup> 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1卷,第63—65页。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以及包括《儒教与道教》在内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部分研究；此外还有不少政论文，特别是宪政论文。今天韦伯全集收录的作品，绝大多数出自这个时期。这期间，韦伯不仅学术多产，还频频参加社会活动，参与成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在海德堡的家里开着星期天沙龙，还经常外出开会演讲。仅1917年就去图灵根参加了两次劳恩施泰因文化大会，一次在圣灵降临节期间，一次在9月。劳恩施泰因古城堡的这个著名活动是出版商欧根·迪德里希<sup>①</sup>主办的，旨在把学术界、文化界、政界的名流介绍给年轻一代，可见那时韦伯已是抢手的名人。9月会议的主题是“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领袖问题”，由韦伯做开幕报告《名人与生活秩序》，讲现代社会的政治领袖<sup>②</sup>。他自己扮演的恰恰是这样的角色，在不少年轻人心目中，韦伯就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两次会议当中，韦伯受慕尼黑进步人民协会邀请去慕尼黑讲过《德国人民对德意志帝国宪法委员会的期待是什么？》<sup>③</sup>。这一年的夏天，他还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批判德国的官僚体制和政党制度<sup>④</sup>。

不当教授的时间里，韦伯有过一段军旅生涯。1914年7月一战爆发，50岁的韦伯毫不迟疑报名入伍，被分配到海德堡后备

① 欧根·迪德里希(Eugen Diederichs, 1867—1930)，有影响的德国出版商，以出版文学、艺术和哲学著作著称。

② 关于韦伯在两次文化会议上的发言和报告，参见《马克斯·韦伯全集》德文版第15卷第701—707页，内中没有全文，只有报道和Ferdinand Tönnis的手记。

③ 参见前引书第710—719页《慕尼黑最新新闻》、《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和《慕尼黑报》的报道。

④ 这些文章后来由Duncker & Humblod出版社结集出版，定名为《新组建的德国的议会与政府》，见前引书第432—596页。

野战医院委员会担任纪律检察官,算是就地从戎。每天 13 个小时的办公室工作一直持续到 1915 年 9 月 30 日,后备医院解散。韦伯奉命退役,和他一起从军的最小的妹妹的丈夫<sup>①</sup>和二弟<sup>②</sup>却再也回不来了。

1917 年 11 月 7 日韦伯演讲的听众也是一个刚刚经历了战争的年轻群体,同一天发生的德皇威廉二世赞助的俄国革命<sup>③</sup>丝毫没有冲淡人们对战局的悲观,沉闷的会场上下交融。韦伯像和自家兄弟谈心,和盘托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感受和伦理认同,引导立志以学术为使命的年轻听众走上他认为正确的人生之路。韦伯从德国和美国大学的人事体制对比入手,先介绍了在德国大学从事学术或者说做教授的前提和程序,然后进入学术工作本身,逻辑与方法是定位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提升研究的知识价值,即有新意,学术工作才有意义。然后韦伯进入学术的内核——把学术作为人生使命,奉内心召唤,献身学术事业。韦伯将献身精神提到人格的高度,“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在韦伯心里,献身是普世伦理,不仅学术领域如此,做什么都要全神贯注。比如文学艺术创作,“纵然像歌德这样的大家,当他冒昧地想把自己的生活当成艺术作品时,在人格上也受到了报复”。他特别鄙视在学术界“以戏班班头自居”的人,他们“把自己应当献身的志业,拿到舞台上表演,想借助‘阅历’证明自己不起了不起……这种人肯定没有‘人格’。今天,这种

① 韦伯最小的妹妹 Lili 的丈夫莉莉/赫尔曼·舍费尔(Hermann Schäfer),一战开始不久死在波兰战场。1915 年 8 月,韦伯曾陪妹妹去波兰扫墓。

② 韦伯的二弟卡尔 1915 年阵亡。

③ 参见维格莱弗:《陛下的革命家》,载《明镜周刊》2007 年第 50 期,第 34—44 页。



现象大量上市,处处透着一股小家子气,也降低了当事人的人格。这种人问,如何才能出人头地,而不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任务——仅仅是任务。这种全神贯注,能把一个人提高到他准备献身的志业的高度,给他以使命感和尊严”。这些话今天依然如高悬明镜,照出伪学者心里藏着的“小”来。在韦伯眼里,他们是没有人格的存在物。

韦伯反对在学术研究中采取某种立场。学术研究避不开诸神之争,真的未必善,善的未必美,美的未必真,效忠某一位神,势必得罪别的神。在诸神之争中,韦伯主张忠于自己的良心,这样才能得出终极的、内在的、有意义的结论。韦伯将此看成为道德力量效劳,有责任感而恪尽职守。这些教导发自肺腑,赋予演讲深厚的哲学意义。

演讲中也有言不由衷的地方,比如反对教师把政治理念带上讲坛,不赞成学生把教师视为政治领袖。韦伯实际做的恰恰相反,他在弗赖堡大学的就职演讲就是一篇民族主义宣言,把国民经济学定性为“民族持久权力利益的婢女”<sup>①</sup>。《以学术为业》演讲之前两天,他还在慕尼黑超党派群众大会上做题为《反对泛德意志危险》的讲话,提出“永不结城下之盟”的口号。当时媒体报

① 韦伯在就职演讲中如是说:“德意志国家的国民经济学和德意志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家只能是德意志的……我们要教给后人的不是和平与人类幸福,而是为保存和发展我们的民族之种而无尽斗争。我们不能乐观,以为最大可能地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就大功告成了,发展成就高的民族会借助自由和平的经济竞争成为胜者。我们要对历史负责的,首先不是传给后人什么样的国民经济组织,而是我们从世界上争来并给后人留下多大的活动范围。权力斗争最终也是民族权力利益的经济过程,民族权力利益受到质疑时,就是终极的决定性的利益,经济政策要为民族权力利益服务,国民经济政策学是一门政治科学。它是政治的婢女,不是行使统治的掌权者和阶级的日常政治的婢女,而是民族的持久权力利益的婢女。”(《马克思·韦伯全集》第4卷,第560—561页)

道，“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作为学者，而是作为政治家来讲道的”<sup>①</sup>。在学生心目中，韦伯早已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尤其是在劳恩施泰因古堡会议之后，领袖宣传立竿见影。这时候韦伯再来反对讲坛上的政治理念，反对学生对教师的政治崇拜，越发言不由衷。

### 以政治为业

到了《以政治为业》演讲时，情况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输了自己发动的战争，用韦伯的口头禅来说，德国人如今成了“政治贱民”。德国政体正在从根本上变革，由君主制走向共和。这期间韦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瑙曼<sup>②</sup>共同创建德国民主党。他的统治社会学已成为社会话题，“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已经定型。来慕尼黑之前，他在维也纳大学开了一学期“经济与社会”课，专门讲统治社会学。无论从政治学的角度还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韦伯都有资格讲这个题目，但是他选择了另一个角度——哲学的角度，把演讲重点放在政治家的伦理上。

### 卡里斯马政治领袖

韦伯从他的三种类型中专门提出卡里斯马统治来，因为卡里斯马领袖最富有为政治献身的精神，是真正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和为了生计而从政的人有本质的区别。韦伯把依靠服从者对

---

<sup>①</sup> 参见《马克斯·韦伯全集》第15卷第724—725页《慕尼黑最新新闻》的报道。关于韦伯的讲话及媒体评价还可参见该书第726—732页《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和《慕尼黑邮报》和《巴伐利亚信使报》的报道。

<sup>②</sup> 瑙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马克斯·韦伯之友，德国民主党第一任主席，魏玛议会成员。

“领袖”纯个人的“卡里斯马”的皈依的统治看成政治事业的最高表现。对先知、军事领袖或民众领袖的皈依意味着，这个具有卡里斯马的个人在人们内心深处是天降大任的领袖，人们不是根据习俗或章程来服从他，而是出自对他的信任，皈依的是他的人格人品。

一个以政治为业的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个人前提呢？韦伯提出三种对于政治家特别重要的素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热情就是献身于一项事业，责任感就是把对事业的责任当作行动指南，判断力是沉静地面对现实的能力，是对事对人的分寸。韦伯把“没有分寸”看成是一切政治家的不赦之罪之一。政治“人格”之“强”，在于具备这些素质。“政治意味着兼用热情和判断力坚毅地钻透硬木。”韦伯这句话如今仍常被德国政治家引用。

韦伯也承认，在卡里斯马统治类型中，领袖并不是权力之争中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更重要的倒是他们所拥有的辅助手段。任何政治暴力统治都需要一定的外在物质手段，卡里斯马统治靠的是领袖的追随者和信徒。但人们不是白追白信，而是相信追求这个人会得到报偿。领袖也必须给追随他的人报偿，精神的报偿，如报仇雪恨；物质的报偿，如官职奖赏，即政治学所谓的“分赃”。

领袖与追随者之外的广大群众，作为被统治者，他们对领袖的崇拜和狂热从何而来？韦伯以英国为例，指出为了运动群众，而加强了纯粹的情绪手段，这是“建立在利用群众情绪基础上的专政”。茫然无知的群众只有通过宣传才会被鼓动起来，为领袖及其追随者所用。政治宣传与宗教传道及经济广告都是通过传播手段达到争取人的目的，依靠人气的卡里斯马领袖更离不开宣传。希特勒 1924 年在《我的奋斗》里就已指出：“宣传的艺术在

于,把握广大群众情绪化的想象天地,用心理学上正确的方式找到通往广大群众的注意力和心田之路。”<sup>①</sup> 囿于时代,韦伯难以看到这种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的统治类型的极权走向。

### 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韦伯把伦理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一切伦理性的行动都可以归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对峙的原则: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这不是说,信念伦理就是不负责任,责任伦理就是没有信念。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过,究竟是按信念伦理准则行事——用宗教语言来说,就是‘基督徒做对了,成绩归功于上帝’——还是按责任伦理原则行事:就是说,当事人对其行动的(近期)后果负责,两者有着天壤之别。”

这种区别类似中国 80 年代初的“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不过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基于西方人的基督教信仰,基于“善”,不同于基于个人崇拜、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两个凡是”。韦伯批判信念伦理,不是批判它追求“善”的目的,而是“在许多情形下,‘善’的目的与人们对道德上可疑的、至少是危险的手段以及产生恶的副作用的可能性或几率的容忍分不开。世上没有一种伦理能够表明:什么时候在什么范围内伦理上善的目的把伦理上危险的手段和副作用神圣化了”。他断定,用目的神化手段,信念伦理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只有一种逻辑可能,那就是摒弃任何使用道德上危险手段的行动”。除了逻辑上的难题,韦伯进一步指出信念伦理不能回避的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

<sup>①</sup> 参见希特勒:《我的奋斗》中“战争宣传”一章。

的关键时刻，一向标榜以爱还暴、以德报怨的信念伦理家，往往“大声疾呼使用暴力，——最后的暴力，它会带来消除一切暴力的局面……这是最后一次，它将带来胜利与和平”。信念伦理家使用暴力，因为他们是宇宙伦理的“理性主义者”，“受不了世界上伦理的非理性”。

韦伯对付信念伦理悖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回到政教分离，回到路德，把对战争的责任从个人肩上卸下，转给政府。在他看来，除开信仰，个人在任何事情上服从政府——这当然也包括使用暴力——都不会有罪。在此基础上，韦伯提出了政治伦理的特殊性，这是由人类团体掌握的合法暴力的专门手段决定的。任何人，特别是政治家，不管为了何种目的同意采用这种手段，都必须跟着它的特殊程序亦步亦趋，最后还要听任它的特殊后果的摆布。谁要想用暴力建立起人世的绝对正义，必然需要人，需要由人组成的机构。政治领袖的成功取决于他是否能不断地给予机构内的人报偿，以使机构运转。这样一来，他所依靠的是这个机构的动机，而不是他本人的动机。他在这种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目标和程度，并不取决于他自己的动机，而是追随者行动的动机，而这些动机从伦理角度看大都低俗小气。按照这个逻辑，政治的异化成为必然。但韦伯认为，只要有一部分追随者真心实意信仰领袖的人格和事业，他就能胜利。

很难设想利益不同的人组成的队伍如何取胜。韦伯这样自圆：“谁要想从事政治，特别是从事职业政治，他就必须意识到那些伦理上的悖谬，意识到他对自己在这种悖谬的压力下发生的变化所要负的责任。他在……与魔鬼的势力为伍，因为这种势力潜伏在任何暴力中。”这是责任伦理。对另一种领袖，韦伯不便使用信念伦理，只好说他们的追求不在此世：“在出世的博爱和慈悲方

面炉火纯青的大家,不论他们来自拿撒勒、阿西西还是印度的王宫,都不曾利用政治手段:暴力,来布道。他们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在这个世界工作。”

韦伯缥缈的推论至少与《圣经》的记载有出入。路加大夫是个实在人,记述了耶稣基督刚出道时的一件事:“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sup>①</sup>青年耶稣的政治理想是在人间建立天国——一个光明和自由的国度。耶稣出生于罗马铁蹄下,是一位天生的革命者。如何实现这个政治理想,马太福音记述了耶稣的话:“从施洗约翰时代到如今,天国容许了一次又一次暴力进攻,施暴力的人们夺取它。”(这是作者的译文,与中文圣经的译文有天渊之别。中文圣经里耶稣的话被译成:“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了。”<sup>②</sup>不知是否有意曲译。)2000年来,耶稣主张暴力夺取政权的意思在主要圣经译本里都保存了下来<sup>③</sup>。纵观基督教史,这支宗

① 《路加福音》4:17-18。

② 《马太福音》11:12。

③ 希腊语原文, ἀπὸ δὲ τῶν ἡμερῶν Ἰωάννου τοῦ βαπτιστοῦ ἕως ἄρτι ἡ βασιλεία τῶν οὐρανῶν βιάζεται καὶ βιάσται ἀρμάζουσιν αὐτήν.

马丁·路德德译译文: Seit den Tagen Johannes' des Täufers bis heute wird dem Himmelreich Gewalt angetan, die Gewalttätigen reißen es an sich.

流行德文本译文: Aber von den Tagen Johannes des Täufers bis heute leidet das Himmelreich Gewalt, und die Gewalttätigen reißen es an sich.

英文本译文: From the time John preached his message until this very day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suffered violent attacks, and violent men try to seize it.

希文 βιάζεται、德文 Gewalt 和英文 violent 都是暴力,德文主动态的 antun 和被动态的 leiden 以及英文 suffer 都是遭受、忍受、容忍,没有“努力”的意思。

教的兴起与发展始终伴随着暴力。圣经并不讳言使徒西门是奋锐党人<sup>①</sup>。虽然时间上可能有误,但耶稣门徒里有暴力革命者是事实。西门追随耶稣,似乎不好用韦伯上面的机构报偿说来解释。西门是信徒,他的主张应该来自耶稣,至少不能与耶稣的主张相悖。即使到了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时代,教会仍未放弃暴力,毫不留情地剿灭希腊罗马本土的异教。

关于早期基督教,其实更适用“用目的神化手段”,或者说,教会有时也按责任伦理行事,通过政治行动,即使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

#### 伦理之争的实际意义

《以政治为业》是一战的产物,其时韦伯已被指定为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顾问,责任伦理正是他对代表德国面对凡尔赛和约的政治家的人格要求,他本人极力维护德国的利益,使战败国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当时慕尼黑是动荡中心之一,1918年十一月革命,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巴伐利亚王路易三世出逃,以主和派埃斯纳<sup>②</sup>为总理的巴伐利亚共和国成立。韦伯对政局失望,一度收回演讲的应许,在1919年初给演讲组织者比恩鲍姆<sup>③</sup>的信中说他没资格讲政治家的职业,并建议瑙曼来讲这个题目。瑙曼因病不能担纲,韦伯还是不打算讲。比恩鲍姆告诉他,有几位同学

① 《使徒行传》1:13。

② 埃斯纳(Kurt Eisner, 1867—1919),左翼独立社会党党员,新闻记者,1919年2月被右翼组织图勒会成员Arco-Valley伯爵暗杀。

③ 比恩鲍姆(Immanuel Birnbaum, 1894—1982),巴伐利亚自由学联成员,1918年十一月革命以后参与建立慕尼黑大众学生会,后来又参与成立德国学生会。二战中流亡北欧,参加抵抗运动。战后任南德意志报外交政策部主任。

想请埃斯纳来讲这个题目。韦伯立即改变了主意,挺身而出,他说绝不能让一个“信念伦理家”占据学联讲坛<sup>①</sup>。

埃斯纳尖锐抨击帝制和战争政策,主张欧洲和平,因而被右翼势力视为眼中钉。1919年2月21日,埃斯纳遇刺身亡。共产党趁机推翻巴伐利亚共和国,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列宁闻讯,立即致电祝贺。4月1日,苏维埃内阁会议通过决议,任命韦伯为慕尼黑大学教授<sup>②</sup>。这个政权存活到5月3日,巴伐利亚白军军团灭了苏维埃,慕尼黑成为右翼政治的老窝,孵化出希特勒和它的国社党。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交代,对出卖战争的十一月革命的愤怒促使他决定从政<sup>③</sup>。

韦伯在演讲中抨击的另一位所谓“信念伦理”人士、“政治稚童”弗尔斯特是慕尼黑大学哲学和教育学教授。弗尔斯特主张追究战争责任,受到右翼学生和教师的围攻,1920年愤然辞职,离开喧嚣的慕尼黑。他在国外出版的《德国人的绝症》一书里紧急呼吁德国人警惕纳粹上台。1933年,弗尔斯特是纳粹开除国籍名单上的第一人,他的著作被焚,狂热的学生骂他是“信念流氓加政治叛徒”。1946年弗尔斯特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了一篇举世瞩目的文章,警告世人,如果德国人不能清算并抵偿思想中可怕的罪恶,重新尊崇一切人类崇高的价值,有可能出现整个世界的普鲁士化<sup>④</sup>。孰是孰非,历史公断。

韦伯所谓的信念伦理,其实是不同意见,所谓信念伦理家无

① 参见柯尼西:《马克斯·韦伯纪念文集》,第21页。

② 巴伐利亚在线:《马克斯·韦伯——慕尼黑伟大的思想家》。

③ 参见希特勒:《我的奋斗》中“战争宣传”一章。

④ 威尔特:《弗里德里希·威廉·弗尔斯特》,载《创意乌托邦》1999年4月号,第5—18页。



非是意见与其相左者。名副其实的信念伦理政治家在政治活动中寸步难行,也成不了政治家。信念伦理家,不过是假想敌把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说成信念伦理家,意在炫示自己是负责的老道政治家。今天德国政界仍喜欢把反对派称为信念伦理家,前总理施密特2007年在世界伦理基金会的演讲又说:“所以我一直认为马克斯·韦伯反对信念伦理、认为责任伦理必要的话至今有效。我们知道,许多人出自信念投身政治,而不是出自理性原因。我们还必须承认,某些内政和外交决策出自信念,而没经过理性的权衡”<sup>①</sup>。我以为,除了塔里班,不会有哪国政府如此决策,如果德国政府真如施密特说的那样,选民也不会答应。可是施密特说:“大部分选民都是首先从信念动机出发,从他们眼下的心理情绪出发决定投谁的票。”<sup>②</sup>好像大部分德国选民不计四年利害,仅凭崇高理想投票。果真如此,就不会出现目前的局面:近三年来各州和联邦选举,没有一个政党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可以独立执政,联合组阁又困难重重,皆因利害权衡,无法统一思想。只要涉及政治利益,人人都是责任伦理家,

### 黑色预言

韦伯在演讲结束时邀请他的听众,10年之后再一次来讨论“以政治为业”。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遗憾的是,我不能不担心,如果那时,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反动时期早已降临,诸位中许多人,坦率地说,包括我自己,所祈望、憧憬的东西只有很少一点能得以实现,大概不至于一点都没有,但起码从外表上看是太多了,

① 施密特:《政治家的伦理》。

② 同上。